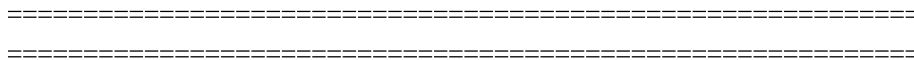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学大城的千年演进：嵌入·链接·耦合



纵观从农耕社会的嵌入对抗，到工业社会的链接互利，再到知识社会的耦合共生，校城关系早已从零和博弈，演变为正和共生关系；彼此之间的双向奔赴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治理合作，上升到价值共创层面，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。



在辽阔浩瀚的时空中，大学与城市一道，作为国家和文明互动演化的产物，携带着相似的基因，相依相伴、相似相融，相濡以沫、相得益彰。他们之间的缘分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缘分。

纵观全球，高等教育机构始终与城市紧密相关。或诞生于城市；或诞生在郊野，但它有一种神奇魔力，可在经年累月中把阡陌乡间点化为城市。可以说，大学从不缺席城市的发展，见证和参与着城市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


1.0阶段：农耕社会的“嵌入”疏离

在农耕社会的漫长岁月里，城市好比凝结在大地上的晶核，社会结构固化且资源集中。此时的大学，无论是欧洲中世纪大学，还是中国古代的官学与书院，都以传承经典为己任，培养着极少数的社会精英。这些大学的早期状态都带有强烈的外来者色彩，以“嵌入”姿态散落于城市格局，与市井生活保持着疏离感。

西方高等教育的历史，交织着“教堂钟声”与“骑士马蹄声”的双重旋律。宗教赋予中世纪大学最初的精神内核与组织模型；世俗城市的实用需求则提供了大学生长的土壤。两条脉络在漫长岁月中缠绕、博弈、融合，共同塑造了大学的独特基因。早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虽多存在于城市之中，但不属于城市。当时的教师和学生大都来自外地，并且背负着特权，与市民争抢资源，就像一个异物、一根鱼刺，在城市机体内存硬生生嵌入，甚至会对城市

造成破坏。在城市的原住民看来，大量师生的涌入，不同的文化、风俗和语言，侵占了城市原有的空间和宁静，还有一些学生滥用特权打架斗殴、酗酒滋扰，使市民与学生间的裂痕越来越大，从开始的对抗发展到械斗，“市民与学人”“城镇与学袍”（Town and Gown）之间的冲突一时间甚嚣尘上，其中尤以牛津大学和牛津城的流血冲突为最，校城关系在对抗与被动接纳间摇摆，一直到13世纪寄宿学院制完善后才得以缓和。

中国存在着类似的轨迹。古代高等教育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套系统，各循脉络兴衰直至清末。官学起于朝廷，始终与城市紧密绑定；而作为私学发展巅峰的书院，其起源具有一定的反城市化特征，经历了在山野发育生长“逃离城市”、再到被科举制度收编“回归城市”的过程。近代以降，随着西学东渐和废除科举，传统书院被西式学堂取代，包括京师同文馆、北洋大学堂、京师大学堂、三江师范学堂以及圣约翰大学在内的新式学校兴起，推进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近代化转型。这一系列转变也主要发生在城市，特别是通商口岸或政治中心。此时大学对城市的贡献，主要是作为雇主、消费者以及精英文化的塑造者，与城市的市井生活隔阂，悬浮在传统社会的表层。

2.0阶段：工业社会的“链接”互利

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工业革命的浪潮重塑了城市与大学的形态：城市演变为分工明确的功能载体；大学则走下神坛、走出象牙塔，不断拓展教育受众，强化了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，从传承经典的“中药铺”转型为为创新知识、输出输出技术、咨询资政的“西药房”。校城关系也日渐紧密，其互动关系从单体“嵌入”进化到了更紧密的化学“链接”，成为难以分离的伙伴。

在西方，浩浩汤汤的工业革命则将校城关系推向了深度融合。高等教育开始成为强国富民的工具，世界科学中心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迁移的轨迹清晰可见——从英国、法国到德国、再至美国，昭示了一流大学所在之处，即是顶尖科技孕育之所，最终成就强国崛起之地。研究型大学与工业实验室的结合，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，美国128号公路、加州旧金山湾区硅谷的兴起，成为大学与产业深度链接的典范。

在中国，大学与城市之间系统性链接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并且呈现出鲜明的“计划性融合”特征。以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为标志，高等教育布局被纳入国家工业化与国防建设的整体蓝图，与城市的功能定位紧密绑定。例如，在东北重工业基地配套建设相应的工科院校；将西北工业大学等服务于国防战略的高校，布局于西安等战略要地；同时，为应对战备疏散要求，推动了一批高校的外迁与新建，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南迁至合肥，哈尔滨工业大学部分系科内迁重庆，清华大学在四川绵阳建立分校等。

这种自上而下、由行政指令主导的校城链接，在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、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同时，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空间格局。然而这种融合模式，也内嵌了一定的体制性局限。由于我国高校存在部属、省属、市属等多种行政管理类型，大多数高校与其所在城市的政府之间并无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。在此体制下，高校实质上是坐落于城市之中的独立“单位”。与部队大院、国企生活区、部委宿舍等同样，大学校园自成一体、功能完备，管理封闭的“小社会”，社会交往闭环完成，没有必要也没有更多途径去与城市产生更多互动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二者的内生性融合的动力。

3.0阶段：知识社会的“耦合”共生

20世纪50年代，世界开始迈入知识社会，东西方大学发展轨迹日渐同频，一起转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。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也更加紧密，进入深度嵌套、动态协同的“耦合”状态。共生共荣、共享共治成为校城关系主要议题。

大学无需被动适应城市，可以主动引领城市更新与功能重塑。为应对学生规模扩大、高校功能拓展与学科体系快速发展需求，大学开始介入城市空间的扩张进程。通过学校“主校区—分校区”的网络布局，有力联动城市“中心城—卫星城”空间结构演进，成为塑造现代都市格局的重要工具。

在知识经济驱动下，大学成为城市发展的创新之锚。1990年代以来，由于公共资助减少与国际竞争加剧，推动许多西方高校“企业化”转型，“创业型大学”应运而生，高校与政府、企业的合作日趋紧密。大学角色升维为区域知识中枢，成为创新源与人才库的核心节点——创新锚。“大学—产业—政府”三螺旋理论精准诠释了这种耦合动力。大学不仅是人才与技术的供给方，更共同营造了创新空间，例如，在高校周边建设大学科技园、产业园、创新孵化器等，通过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企业孵化等方式，深度嵌入区域创新生态，完成了从社会边缘到发展中心的角色跃迁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生，剑桥大学与剑桥科技园的互动，皆是经典螺旋案例。而且西方高校在资本运作模式上更为深入，它们通过基金会、捐赠基金或关联的资产管理公司，介入房地产开发与资产运营，构建起复杂多元的校城资产关系。

在中国，独特的制度优势催生了更快更有力、更具规划性的校城耦合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高等教育体系也随之迎来深刻变革。在持续扩大招生规模的背景下，国家鼓励高校与生产企业加强联合，产学研结合不断深入。在管理机制上，1992年，按照“共建、调整、合作、合并”方针，大多数高校的管理权被下放至省级政府，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纽带。

进入新时代，校城之间围绕创新空间营造与创新生态培育的合作持续深化，互动也更为主动。政府通过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，积极引导大学的空间布局、学科方向与区域产业升级、城市发展战略同频共振。遍布全国的“大学城”与高教园区，其角色已远远超越教学科研容器，而被定位为区域发展的人才高地和创新引擎。例如，上海“大零号湾”西安的创新港、成都的环高校知识经济圈、武汉的光谷科创大走廊等，都是校城深度融合、共塑创新格局的典范。高校布局呈现出“跟着产业走”的主动逐浪姿态，通过在前沿产业聚集地设立异地校区、新型研发机构、产业学院和卓越工程师学院。在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，“校区、园区、社区”三区融合，“校园-大学科技园-产业园”三园递进，日渐成为普遍实践。

小结

诚然，当下校城深度融合中亦面临一些烦恼。例如，有人抱怨实验室的气体排放，高校的巨型体量可能挤占道路、停车位等公共空间，大学高层次人才富集也可能推高城市的生活成本，甚至加剧教育内卷等，存在着外部性和张力。加之近年来校园封闭化管理带来的物理阻隔，考验着双方的协同智慧。——但这些只是成长的烦恼。城市终究越来越悦纳和重视大学，开始将大学视为战略性资产，在规划、政策、公共服务上倾注资源。

与此同时，大学正更深度地融入城市的创新网络与社会治理，其独有的文化禀赋、国际化链接，以及更为宝贵的、永远青春洋溢的师生群体，将持续为城市注入活力。大学对城市的贡献，已从传统的人才输出、技术支撑，全面扩展到促进区域内生性增长、培育新质生产力等多元维度，成为城市有机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。